上海交通大學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安泰经管学院 ANTAI COLLEGE Economics·Management

安泰新见解

ANTAI INSIGHT

Vol 2024. 03

黄　立　企业赋税遵从中的对等互惠 —— 来自臭氧污染的证据

江浦平　可追溯性技术在食品供应链网络中的影响

许文健　金融危机期间的就业下降：地方劳动力市场新视角

ANTAI INSIGHT
Vol 2024 03

企业赋税遵从中的对等互惠
—— 来自臭氧污染的证据

黄 立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会计系助理教授。2023年毕业于香港城市大学，获得会计学博士学位。

研究方向：税务与资本市场，财务会计
电子邮箱：lhuang-acem@sjtu.edu.cn

空气质量和公共财政收入之间有何关联？地面臭氧（ground-level ozone）是美国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NAAQS）列出的最常见的空气污染物之一。与其他已得到有效治理的空气污染物相比，地面臭氧浓度在过去40年里居高不下。医学研究证据表明，短期和长期接触臭氧都导致健康问题，如肺功能损伤，哮喘和过早死亡等。

基于国家与公民关系的契约论观点（洛克[1690]，卢梭[1762]），对等互惠(Reciprocity)在赋税遵从中发挥核心作用。由于对等互惠机制的存在，民众通过纳税委托政府提供优质公共产品；而政府是否有效和负责任地支配税收，会反映在其提供的公共产品质量上，从而影响公民的纳税意愿。若地面臭氧污染得不到有效治理而造成福利损失，当地公民的纳税意愿将会下降。对于企业纳税者，考虑到其所在地的利益相关者受空气质量影响，企业纳税的效用函数也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当地公共产品质量，如地面臭氧污染程度。

我们在美国的情境中发现，企业纳税筹划的强度与地面臭氧污染程度正相关。以政府修改臭氧污染界定标准为准自然实验来建立因果识别，我们发现，标准更严格后那些由于标准收紧而被划为非达标的县加大治理以求减少臭氧污染而达到新标准要求。因此，与其他地区的企业相比，总部坐落于这些减少臭氧污染县的企业降低了纳税筹划的强度。进一步分析表明，地面臭氧污染与企业纳税筹划强度之间的关系会受到以下因素的调节：公众对臭氧污染的关注度，臭氧污染所带来的潜在福利损失，管理层的利益相关者导向，企业自身对环境的污染情况，政治偏好，以及民众规范常态。本文还使用美国政府清理危险废物的“超级基金”的场景发现了一致的结果，说明对等互惠机制的普适性也存在于臭氧污染以外的其他污染类别。

本文利用臭氧污染及其监管为情境来识别公共产品质量与企业赋税遵从之间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揭示了纳税人和政府间的互惠是一个影响公司纳税筹划的潜在机制。因此，政府对环境的治理改善可以激励自愿纳税并扩展其未来财政收入。除了加强监督或执法力度外，政策制定者还可以通过提升公共产品质量提升赋税遵从的内驱力。

英文原文信息： Chow, T ; Fan, ZW ; Huang, L ; Li, OZ; Li, SM . (2023). Reciprocity in Corporate Tax Compliance-Evidence from Ozone Pollution.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61 (5), 1425-1477.

可追溯性技术在食品供应链网络中的影响

食品供应链由于其层级多，不透明，农产品存储时间短等特点，长期以来，当食品污染事件发生时，由于难以快速追溯污染源，往往采取大规模召回销毁的处理方式。既造成大量的食物浪费，又会给供应链乃至市场造成巨大冲击。提高食品供应链中的可追溯性一直是产业界持续减少污染风险和食品浪费的努力的重要部分。最近的技术进步，如区块链技术，进一步推动了创新零售商在其供应链中推广食品可追溯性系统。然而，可追溯性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供应链参与者的经济动机、食品的安全性、以及大规模销毁造成的食物浪费缺少量化的评估。

为了理解这些问题，我们建立了一个具有多个源头供应商（第3层）单个中间商（第2层）和单个零售商（第1层）的三层供应链经济学模型，用以研究可追溯性技术如何影响供应链成员的经济动机，以及其潜在的好处是否以及如何得以实现。

英文原文信息： Dong, L; Jiang, PP and Xu, F. (2023). Impact of Traceability Technology Adoption in Food Supply Chain Networks. *Management Science*, 69 (3), 1518-1535.

我们发现，可追溯性存在两种相互对抗的效应。一方面，可追溯性可以精确定位污染来源，保证未被污染的食品免于处置，由此为每个供应链成员带来收入增长（纯可追溯性效应），但是先前危机处理中大规模召回销毁的这种“连坐”惩罚的消失，也让供应链参与者对污染风险的承受力得到提高，从而下游买家对于通过提高进货价格来激励上游供应商控制污染风险的动机受到削弱，进而使供应链的每一层都容易受到其下游买家通过策略性地降低购买价格的剥削（策略性定价效应）。

令人惊讶的是，纯可追溯性效应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无法克服策略性定价效应的负面影响而最终导致供应链的某些成员（甚至是第1层零售商）在部署可追溯性系统后面临更高的局部污染风险和更严重的经济损失。针对该现象，我们发现，当第2层中间商的策略性定价权力被消除或削弱时，零售商总是从可追溯性中受益；在具有大量第3层供应商的网络中，所有供应链成员也都从可追溯性中受益；更重要的是，如果规定供应链参与者不可在部署可追溯性系统后调整价格（即完全消除策略性定价效应），则供应链成员的收益都会提升，且食品的污染风险会下降。

该研究对产业界的启示是：为获得可追溯性带来的经济效益并提升食品安全性，单纯部署追溯系统可能是不够的，需要依照供应链的结构配套采用可以实现共赢的交易行为准则。

江浦平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管理科学系助理教授。2022年博士毕业于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Olin商学院，获得运营管理学博士学位。

研究兴趣：收益管理，算法设计，信息与风险管理
电子邮箱：jiangpuping@sjtu.edu.cn

金融危机期间的就业下降：地方劳动力市场新视角

就业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最近关于我国青年高失业率的讨论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就业问题的广泛关注。经济危机的发生一般都伴随着就业水平的大幅下降。这背后具体的传导机制是怎么样的？我们可以提前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就业下滑？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例，以往文献主要提出了两个解释：1. 需求角度，即金融危机期间房价的大幅下跌，导致居民财富的下滑，进而使得居民对企业产品需求的疲软，因此企业无需那么多员工进行生产，从而选择了裁员；2. 供给角度，即金融危机期间很多商业银行亏损严重，导致企业融资困难。企业没有足够的流动资本进行劳动力囤积（labour hoarding）以等待经济复苏。在这两个解释的基础上，本篇文章提出一个新的视角，来解释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就业下降的原因。

许文健

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金融系副教授，美国密歇根大学经济学博士。

研究方向为公司金融，劳动经济学，以及创业与创新。其研究发表于 *Economic Journal*,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World Development* 等国际一流期刊，以及经济学（季刊）等国内一流期刊。

电子邮箱：wenjianxu@sjtu.edu.cn

英文原文信息： Xu, W. (2023). Employment Decline During the Great Recession: the Role of Firm Size Distribution. *The Economic Journal*, 133(652), 1586-1625.

首先，通过对美国微观数据的观察，本文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地方劳动力市场比较集中的地方，也就是大多数员工被少量企业所雇佣的地方，金融危机期间就业幅度下降更多。为了更好地理解该现象，本文建立了一个具有企业异质性的动态模型。该模型的解析解（analytical solution）显示当企业面临个体性冲击（idiosyncratic shocks）时，地方劳动力市场的集中程度（由赫芬达尔指数来代表）会放大负向冲击的影响。直观解释是当地方劳动力大部分集中在少数企业中，而该企业遭受个体性冲击（idiosyncratic shocks）时，会被迫裁掉很多员工，当地的工资水平也随之下降。该地方的其他小企业虽然没有遭受冲击，在面临下降的工资时，有增加劳动力的动机，但是他们没有能力吸收掉很多被大厂裁掉的员工，因此在这一情形下，该地就业水平下降幅度相对于那些集中度不高的地方而言会超出很多。即使最后我们加总了其他各类情形，比如当地方小企业遭遇冲击时，集中度高的地方就业下降幅度要稍小一点，我们依然发现由于在第一种情形下的就业超幅下跌处于主导作用，使得集中度高的地方在面临负向的个体性冲击时，就业水平平均下降更多。我们还通过数值模拟印证了模型的解析解。

其次，我们通过实证分析，排除掉了关于该现象的很多其他竞争性的解释。例如，我们发现集中度高的地方就业下降幅度更多，不是由于这些地方的地区差异或者行业差异所导致的，也不是由于这些地方的劳动力市场规模小，或者该地方企业财务杠杆高从而受金融危机影响更大所引起。排除掉这些解释后，本文实证结果进一步证实了前面模型所提出的解释：地方劳动力市场的高集中度会恶化在面临企业个体性冲击时员工再就业的调整过程，使得就业下降更大。

最后，考虑到地方就业下降幅度大，不一定代表这些人失业，有可能他们是换了一个地方或者行业工作，我还考察了地方失业率和退出劳动力市场人数的变化。本文发现劳动力市场的集中程度高的地方，失业率和退出劳动力市场人数也更高。这更加印证了前面所发现的这些地区就业人数下降更多的结论。本文对于劳动力市场的集中程度高的地方的工资和产出水平变化以及不同行业的差异还有进一步的分析。由于篇幅所限，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查阅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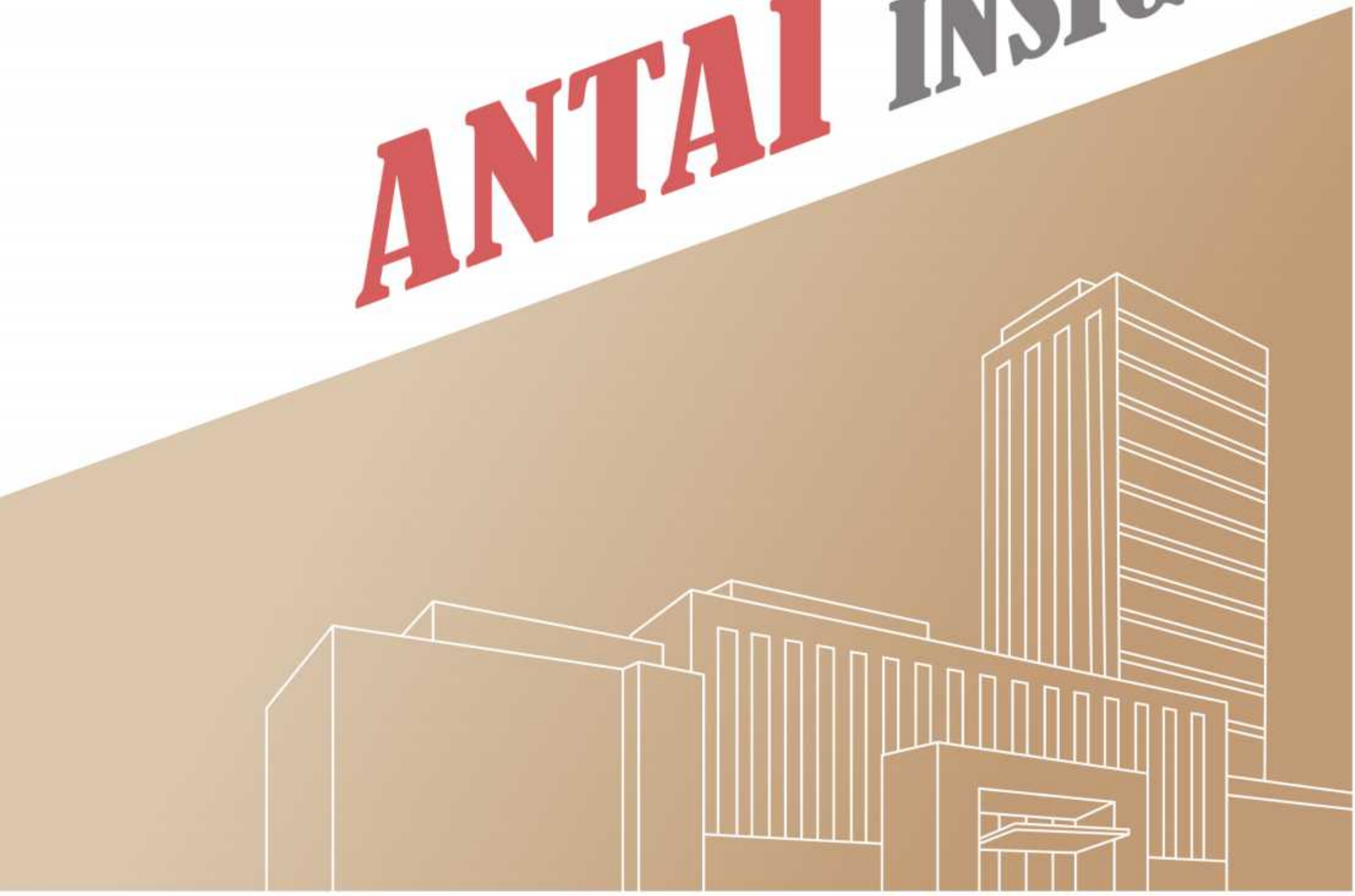
本文的结论对于我国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时如何选择企业和行业以及如何建立一个富有弹性的企业生态系统来应对未来的负面冲击具有参考意义。本文集中考虑地方劳动力市场的高集中度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为我们思考大型和超大型企业的经济社会影响，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主编：才凤艳

责编：白金兰

设计：徐运周

ANTAI INSIGHT



学科建设与科研办公室

上海市华山路1954号包兆龙图书馆B602

86-21-62933681